

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析^{*}

孙德刚

[内容提要]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以色列同伊朗上演了激烈对抗的一幕,以伊关系呈现出类似而又不同于美苏冷战的战略对抗关系——军事上的遏制与反遏制,政治上的讹诈与反讹诈、经济上的制裁与反制裁、外交上的围堵与反围堵。以伊这种关系折射出维持现状的以色列与挑战现状的伊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争夺、伊朗核问题和围绕“大屠杀”的历史争论是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源。以伊对抗关系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以色列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取代阿以矛盾,成为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并使大国在中东的关系更趋复杂。

[关键词] 伊朗核问题 战略对抗 以色列与伊朗 中东安全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安全研究。

在中东,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的发展最具戏剧性。60年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大体经历了战略联盟期(1979年以前)、激烈对抗期(1979-1981年)、心照不宣合作期(1981-1988年)、冷和平期(1988-2005年)与战略对抗期(2005年至今)五个阶段。建国初期,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主张远交近攻,制定了外围联盟战略,主张联合阿拉伯外围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反阿拉伯国家采取反包围战略。当时以、伊分别是美国在地中海东岸和海湾的两大桥头堡,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与土耳其一道组成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铁三角”。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以伊关系急剧恶化,由战略联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以伊在反对伊拉克问题上达成默契,以向伊朗出售了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两伊战争结束后,以伊维持了近17年的冷和平。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以伊朗核问题为焦点,以伊关系再度恶化,双方互以战争相威胁,以伊矛盾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对抗性的矛盾。

一、以伊关系的对抗性特点

近年来,以伊关系在“冷和平”与“热战”之间徘徊

本质上属于战略性对抗,亦即在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前提下,动用各种战略资源,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抗。目前伊朗境内的犹太人数量在中东位居第二,仅次于以色列,但这一情况丝毫未能缓解以伊敌对情绪。以伊对抗关系与二战后的美苏冷战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相似之处在于:第一,对抗的全面性。与美苏一样,以伊关系也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处于紧张状态,双方军事上的竞争很激烈,但都努力避免爆发正面冲突。美苏冷战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竞争。以伊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安全等高级政治层面,而且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低级政治

* 本文是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为07CGJ003;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Iran: Briefing and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0th Congress, January 31, 2007, p. 91.

“At Each Other's Throats: Israel and Iran”,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6, 2008.

目前国外学者对以伊关系的研究可参见 Yaakov Amidror, “The Hizballah - Syria - Iran Triangl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7; Shahrām Chubin,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层面。以色列建立了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多党制、市场经济,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唯一的“西方国家”;伊朗则选择了伊斯兰神权制度,强调伊斯兰文化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典型的“东方国家”。以伊战略对抗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制度与价值观的博弈。内贾德总统曾致信布什,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遭到全体穆斯林的反对,而且为全人类所反对”,他甚至奉劝西方停止支持犹太“腐朽民族”。2009年4月20日,内贾德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上称,1948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一个“极端残暴、彻底的种族主义政权”。这与美国将苏联视为“邪恶帝国”具有相似性。

第二,实力的对称性。冷战期间,美苏基本维持了对称性权力关系,苏联在国土面积、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弥补了其在武器性能、经济和科技上的劣势。同样,以色列军事、经济和科技发达,伊朗虽稍逊一筹,但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有形因素方面占据优势。目前,伊拉克由什叶派主政,巴林70%的人口和沙特15%的人口属于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也是什叶派组织,它们与巴勒斯坦哈马斯一起充当了伊朗的战略后盾,弥补了伊朗军事实力的弱势。因此,以伊之间的总体实力对比也呈对称性。

第三,攻防的二元性。美苏爆发冷战主要是因为“修正主义”大国苏联挑战了美国所缔造的霸权体系,而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构建“联盟锁链”也侵蚀了苏联的战略防御地带,双方在战略上亦攻亦防。同样,以伊也各有攻、防。一方面,以色列在中东充当美国霸权的稳定器,试图遏制正在崛起的伊朗,处于守势;伊朗是事实上挑战西方霸权体系的国家,处于攻势。另一方面,伊朗东部是驻扎有北约军队的阿富汗,西部是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西南部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与星罗棋布的美国海湾军事基地,以色列亦通过不同渠道显示对伊朗动武的决心。如2008年11月,以色列派出100架F-5和F-6战斗机,在希腊以东海区进行打击伊核设施军事演习,时任总理奥尔默特随后会见1981年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总策划人塞拉(Avian Sela),也彰显了以

色列的攻势和伊朗的守势。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背景、矛盾性质、对抗烈度和应对手段不同,以伊对抗关系与美苏冷战有显著差别。一方面,二者战略目标不同。美苏冷战的目标主要是遏制对方,使对方不具备对本国构成安全威胁的能力。在双方战略核力量处于恐怖平衡的状态下,美苏欲摧毁对方无异于将毁灭自己。因此,美苏冷战的底线是不触及对方的核心利益——主权、领土完整与势力范围,双方不仅保持正常的外交渠道和对话平台,而且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密切沟通,斗而不破。当前以伊各自的长期战略目标不仅是遏制对方,而且是摧毁对方。以、伊不是全球性大国,无需承担维护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的特殊责任,其对外行为更具短线特点和易变性。以伊至今未建立外交关系,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一旦危机爆发而引发误判甚至军事冲突的概率比较大。伊朗总统内贾德2005年10月曾公开宣称,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前副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佩雷斯2006年5月8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宣称“伊朗也是可以将从地图上抹去的。”两国官员乃至民众中的对抗情绪也很强烈。如2008年8月,伊朗观光局副局长马夏伊(Esfandiar Mashai)的言论“各国人民都是伊朗的朋友,包括美国人与犹太人”,就在伊朗掀起轩然大波,伊朗290名议员中有200人联名要求总统解雇他。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发表讲话,公开反对“犹太人是伊朗的朋友”这种提法。另一方面,二者具体任务不同。美苏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扩张,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美要在全球拓展民主、自由等价值观,防止苏联在世界各地制造动荡;苏则长期将解放被压迫民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防止西方颠覆作为增强自身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以伊对抗关系中,两国没有传

Ze'ev Maghen, "Eradicating the 'Little Satan': Why Iran Should Be Taken at Its Word", *Commentary*, Vol. 127, No. 1, 2006, pp. 7-11.

"Israel's Worst Fears", *Newsweek*, January 12, 2009.

Mei Frykberg, "Attack on Iran not Ruled out", *Middle East*, No. 394, 2008, p. 30.

Nathan Guttman, "Iran can Also be Wiped off the Map", *The Jerusalem Post*, May 8, 2006.

Nazila Fathi, "Israelis as Friends? Iran Legislators Say No",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2008.

播自身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特殊需要,也没有将意识形态扩张视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提升自身安全利益作为谋取战略对抗胜利的主要路径,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色彩。

此外,二者依靠力量不同。美苏进行冷战的主要依靠力量是联盟,如苏联依靠华约,美国依靠北约、美日、美韩、美澳新联盟等,各自都以正式的军事联盟协定为基础,由此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意识形态共同体。以、伊均奉行准结盟外交,强调不与他国结成永久性联盟,而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签订临时性合作协议,两国的准联盟外交具有松散性、动态性、临时性与不稳定性特征。以色列虽同美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但从未与美签订正式盟约;伊朗同叙利亚于2006年6月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2007年3月又签订新的合作协定,但两国从未正式结盟。

二、以伊对抗性关系的根源

以伊对抗性关系不只是以伊双方的问题,还涉及双方尤其是伊朗一方同西方大国、国际体系、核不扩散机制、中东格局等诸多复杂问题。就以伊双边关系而言,其对抗性本质上反映了中东霸权国以色列同正在崛起的霸权挑战国——伊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而具有长期性与尖锐性。以伊之间对抗性关系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两国价值观的差异,而在于安全利益冲突。首先,以伊对抗性关系根源于中东核垄断与反垄断斗争,焦点是伊朗核问题,其深刻背景则是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伊朗认为,随着本国人口数量增加和世界原油需求量上升,伊朗必须发展核技术才能保持国内和国际能源供求平衡。产油国同非产油国一样,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对伊朗来说,掌握核技术还具有权力象征意义,可以获得与其邻国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对手国家(事实上的核国家以色列)平等的核地位。伊朗目前主要有四个生产核裂变材料中心:位于伊斯法罕的铀转化设备中心、位于纳塔兹的铀浓缩基地、位于阿拉克的重水生产工程与钚生产反应堆、位于布什尔的核电站。2009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告指出,伊朗现有大约630千克的低浓度铀。以色列专

家认为,这已足够生产一枚核弹。

伊朗80%的民众支持国家发展核技术,并认为这是伊朗科技振兴的重要里程碑。2005年7月,内贾德宣布终止同欧盟签订的协议,撕去IAEA贴的封条,在伊斯法罕恢复了铀转换活动。9月,内贾德发表讲话指出:“8年里(1980-1988),萨达姆政权对伊朗人民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使用了各种毁灭性武器,包括使用化学武器。当时是谁用这些武器武装了萨达姆?那些声称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是如何对此作出反应的呢?”作为一名退役老兵,内贾德深切体会到两伊战争的残酷性,更痛恨当时美国对萨达姆的纵容。他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谋求通过掌握核技术,增加同以色列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将伊核计划比作“川流不息的洪水”,是“火柴棒所无法阻挡的,一国不能以毫不相干的借口阻止另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近年来,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帮助伊朗培训了大批核技术专家。截至2009年2月,伊朗已启动了5000多台离心机中的4000台,且拒绝IAEA的核查。

伊朗谋求核技术挑战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削弱了以色列核威慑能力。以政府认为,伊朗发展核能完全是研制核武器的借口。前总理奥尔默特曾发表讲话说:“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我们不允许它变成现实。”以坚决反对伊核计划,还因为其担心一旦伊拥核,将在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中形成大规模扩散之势。2008年11月,以国防部一份安全报告指出,政府在

“Syria, Hizbullah, Iran Prepare in Case of Wa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6, 2007.

Jo - Anne Hart, “Perceptions and Courses of Actions toward Iran”,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 - October 2005, p. 12.

Whitney Raas and Austin Long, “Osirak Redux? Assessing Israeli Capabilities to Destroy I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4, 2007, pp. 12 - 13.

“Israel's Worst Fears”, *Newsweek*, January 12, 2009.

Colin Dueck and Ray Takeyh,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2, No. 2, 2007, p. 196.

Alireza Jafarzadeh, *The Iran Threat: President Ahmadinejad and the Coming Nuclear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192 - 193.

“New Developments in Israel and Iran's Nuclear Program”, *Targeted News Service*, February 20, 2009.

Andreas Malm and Shora Esmailian, *Iran on the Brink: Rising Workers and Threats of War*,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 178.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加强地区合作的同时,必须为应对伊朗跨越“核门槛”制定应急方案;2009年3月31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必须尽快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否则受到威胁的以色列将被迫单独袭击伊朗核设施。”

其次,以伊对抗关系还源于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争论。内贾德是近年来第一位公开质疑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国家元首。他曾发表电视讲话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完全是捏造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世界殖民者征服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伎俩。”内贾德曾用调侃的口吻说:“有些欧洲国家坚持认为二战期间希特勒将上百万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屠杀他们,如果历史学家、评论家或科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就会受到监禁或谴责。我们不相信‘大屠杀’是事实。即使是真的,欧洲人也应让德国、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划出几个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补偿,让他们在欧洲建国,我们也会拥护的。”伊朗政府强调,以伊交恶是穆斯林与犹太人长达1400年敌对关系的延续。内贾德公开号召穆斯林推翻以色列。以伊不仅爆发了数轮口水战,而且都以战争相威胁。内贾德认为,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是纯洁的伊斯兰土地上“可鄙的污点”和“毒瘤”,是一棵“朽木”和一间“草棚”。真主党与哈马斯已分别将“以色列懦夫”赶出了黎巴嫩和加沙,现在以色列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并极速衰败,全体穆斯林必须趁势将它赶出中东。伊朗领导人否认犹太人“大屠杀”历史、宣称要毁灭以色列,无疑触及了犹太人的神经,并引起以色列的强烈反应,后者认为这是纳粹主义思想的复活。奥尔默特说:“当一国元首声称要消灭我们时,这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防范和阻止之事。”

最后,地缘政治争夺强化了以伊对抗关系。作为社会制度、价值观截然对立的两个中东大国,以伊在中东争夺领导权有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考虑。以色列是地中海东岸头号军事强国,是中东唯一的事实上核国家;伊朗是海湾头号军事强国,拥有俄制SA-2、SA-5、SA-6和SA-7导弹,还计划从俄罗斯购置先进的S-300P导弹系统。伊朗自主开发的

“流星-3”型导弹于2008年7月试射成功,射程1330公里,可覆盖以色列,具有强大的威慑能力。以色列官员还透露,伊朗正在研制新的“流星”系列弹道导弹,射程达4900-5000公里。所以,萨达姆政权瓦解后,以伊争夺目标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肥沃新月地带”,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一直到海湾地区。其中,海湾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目前每天大约1500万桶原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世界各地。^⑩

近年来,以伊争夺“肥沃新月地带”更趋白热化。由于伊朗同叙利亚准结盟,叙利亚成为伊朗在地中海的桥头堡;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对以色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般认为,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2008年12月以色列同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均是以伊地缘政治争夺的产物。^⑪以伊地缘政治争夺的范围还扩大到政局不稳的伊拉克。伊拉克什叶派执掌政权、伊朗同伊拉克新政府实现历史性和解无疑改变了海湾地区的权力平衡,使以色列难以发挥“离岸平衡手”作用。伊朗、伊拉克什叶派激进组织、叙利亚、哈马斯和真主党形成的“激进势力轴心”似在重塑中东权力格局,它们成为以色列打压的主要对象。

“以色列国防部出台安全报告”,<http://str.chinaaiiss.org/content/2008-11-24/24123236.shtml>

Jeffrey Goldberg, “Netanyahu to Obama: Stop Iran - Or I Will”, *The Atlantic*, March 31, 2009.

Alan M. Dershowitz, *Preemption: A Knife That Cuts Both Way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 176.

Hussein D. Hassan, “Iran: Profile and Statements of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uary 16, 2007, p. 3.

Ze'ev Maghen, “Eradicating the ‘Little Satan’: Why Iran Should Be Taken at Its Word”, *Commentary*, pp. 7 - 11.

“Islam and the Nazis”, *The Spectator*, January 24, 2009.

Gawdat Bahgat,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7, p. 28.

Peter Crail, “Iran Space Launch Raises Missile Concerns”, *Am s Control Today*, Vol. 38, No. 7, 2008.

Kathleen J. McInnis, “Extended Deterrence: The U. S. Credibility Gap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3, 2005, p. 172.

^⑩ Mel Frykberg,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Israel’s Wars of Attrition Heat up”, *Middle East*, No. 393, October 2008, pp. 12 - 13.

^⑪ Matthew Levitt, *New Arenas for Iranian - Sponsored Terrorism: The Arab - Israeli Heartland*,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2, p. 1.

三、以伊对抗的新态势

以伊战略上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安全利益上的零和博弈——任何一方的权力提升都会被另一方看成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双方对彼此之间的权力消长十分敏感。在这场激烈的对抗博弈中,以色列主打“反扩散”牌,而伊朗主打“泛伊斯兰主义”牌与“能源”牌。

以色列的“反扩散”牌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利用国际舞台开展多边外交,强调伊朗谋求核技术、试射新式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核不扩散条约》及附加议定书,并敦促安理会和 IAEA 向伊朗施压,加大遏制力度。以伊对抗关系引发不同层次的矛盾。一是美国同伊朗的矛盾,即谋霸与反霸的矛盾;二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同伊朗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伊朗将以何种方式弃核问题;三是以色列同伊朗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地区领导权问题。这三组矛盾的另一端皆是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的伊朗。以色列在同伊朗的政治斗争中积极利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打着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旗号,压缩伊朗的政治生存空间。2009年1月,内塔尼亚胡在会见来访的欧洲领导人时敦促欧盟与以色列一道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近年来安理会相继通过制裁伊朗的 1737、1747 和 1803 号决议,与以色列开展的多边外交不无关系。

其次,联合美国遏制伊朗。2008年,美国两艘航空母舰游弋于海湾,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奥巴马于 2008年7月访问以色列时也指出:“伊朗拥有核武器必将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必须加以阻止。”2008年12月底加沙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将在中东“保证盟友的安全与和平,保卫自由的以色列人民”。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加深,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不与伊斯兰世界为敌,新政府将在执政第一年召开美国与全体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大会。2009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穆恩(Patrick Moon)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洪扎德首次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磋商。奥巴马新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引起以色列的极度恐慌。以色列前进党领导人利夫尼(Tzipi Livni)曾公开唱反调:“现在

美伊对话时机尚不成熟,以色列反对美伊对话。”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美伊关系积重难返,以色列联合美国、遏制伊朗的战略不太可能受美国政府改组的影响。加沙战争爆发后,美国两党联合民意测验结果即显示,美国民众中有 56%的人指责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挑起了战争,只有 18%的人认为是以色列挑起了战争;57%的受访者站在以色列一边,而只有 8%的人站在哈马斯一边。这表明美对以战略合作在美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

再次,争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以色列强调,伊朗军事崛起既威胁到以色列,又威胁到阿拉伯国家,打破了海湾军事平衡。海湾国家认为,伊朗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联酋三个岛屿,必须归还;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扶植什叶派力量,必将导致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出现“泛真主党化”现象。但加沙战争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未站在以色列一边反对伊朗,而是认为美以在中东谋求霸权是中东热点问题的根源。这些国家既对伊朗的崛起保持警惕,又期待伊朗能够平衡美以,阻止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实施。2008年,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强调必须通过外交等和平手段解决伊核问题;2009年1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希望化解伊朗对美国与伊拉克特殊关系的疑虑。

最后,将先发制人打击作为对付伊朗的杀手锏。2008年5月,以色列前副总理莫法兹指出,如果安理会对伊朗制裁无效,军事行动必将是阻止伊朗铀

“Obama Must Assure Israeli Security for Peace”,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January 19, 2009.

“Israel Ground Operation Aims to Strike Blow to Iran-backed Hamas”, *Targeted News Service*, January 4, 2009.

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Radio Address”,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 45, No. 45, 2008, pp. 1-2.

Olivier Roy and Justin Vaisse, “How to Win Islam Ov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08.

Peter Crail, “Israeli Officials Wary of U.S. Shift on Iran”, *Ams Control Today*, Vol. 38, No. 10, 2008.

“Poll Shows America Stands with Israel, Worried about Iran”, *Targeted News Service*, January 14, 2009.

Alellet Yehiav, “The Anti-Iranian Front: Egypt, Saudi Arabia, and Jordan”, *Middle Ea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7, pp. 6-9.

Kimi Yoshino, “Iraqi Prime Minister Maliki Visits Iran”,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4, 2009.

浓缩的唯一办法。2009年4月18日,以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如果接到命令,国防军可以在几天甚至在数小时内袭击伊朗核设施。军方正在各个层面做准备。这传达给伊朗的信息是,我们对它的威胁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目前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战略难以付诸实践,如果从潜艇发射导弹打击核设施,精确度较低;如果出动轰炸机进行空袭,需穿越约旦和伊拉克,难获允许。此外,以军事行动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2008年10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指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胆敢对我们的利益采取丝毫行动,它所控制下的所有土地都将是 不安全的,因为那个国家完全在伊朗导弹的射程之内。”

面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朗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防范,一方面是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包括加紧制造潜艇,优先发展海军,如2008年10月28日,伊朗宣布在阿曼湾贾斯克建成新的海军基地;另一方面,伊朗积极争取国际支持,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调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反以势力。2009年4月15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赛义德·贾利利在会见伊拉克高官时指出,两国将发挥一切潜力促进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伊朗联合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乃至伊拉克什叶派中的激进组织构建“伊斯兰反以轴心”,使以色列可能在战略上腹背受敌。第二,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俄有300家公司参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建设。通过核能合作,俄伊加强了外交协调。近年来伊从俄购买了“托尔-M1防空导弹系统;2009年2月,伊朗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纳贾尔访问俄罗斯,并与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就军事技术合作举行了会谈。纳贾尔随后强调指出:“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通过外交和宣传手段试图破坏俄伊军事交流,但两国关系密切、牢固。”今后,不排除俄向伊出售S-300P防空导弹系统的可能。再次,同朝鲜、委内瑞拉等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西方媒体称,近年来伊朗通过进口朝鲜发动机,开发了“流星-3”型导弹;2009年3月,伊朗向朝鲜派出了15人的火箭与卫星专家,以帮助朝鲜发射火箭。伊朗代表团还带去了内贾德写给金正日的亲笔信,强调两国加强空间技术合作的

重要性。2009年4月初,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伊朗,与伊方签署了经济与能源合作协定,双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在4月9日访华期间,查韦斯强调伊朗已经与中国和日本一起,成为国际新体系的重要一极。最后,利用大国之间矛盾,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伊朗打着“以能源换支持”的旗号,努力摆脱在与以色列斗争中的不利地位。2009年恰逢日本与伊朗建交80周年。4月中旬,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在与伊朗外长穆塔基举行的会见中表示愿意保持与伊朗的密切关系,伊朗还赋予日本开发伊南部艾扎德干油田的独立谈判权;2008年4月,内贾德访问印度,两国签署协议,规定印度将对伊投资41.6亿美元,修建2600公里长的油气管道,用于印度从伊朗进口天然气。2009年4月,印度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伊朗政府提交了开采11亿立方尺天然气并将其液化后出口的计划,该计划总投资约30亿美元,估计很快就会获得批准。伊朗还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2007年12月,中伊正式签署协议,于2009年合作开发亚达瓦兰油田,项目投资约20亿美元。^⑩2009年4月,伊朗第一副总统达乌迪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伊方愿与中国进一步开展能源与金融合作。不过,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大国同以色列存在密切的经贸合作,且不能不顾及美欧的合理关切,因此在以伊对抗中基本

“Chronolog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4, 2008, p. 676

Sheera Frenkel, “Israel Stands Ready to Bomb Iran’s Nuclear Sites”, *The Times*, April 18, 2009.

Mel Frykberg,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Israel’s Wars of Attrition Heat up”, pp. 12 - 13.

Nazila Fathi, “Iran Opens Naval Base near Shipping Routes for Persian Gulf Oi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2008.

“Jalili Underlines Need to Expand Iran - Iraq Cooperation”, *Iran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April 15, 2009.

“Israel Cannot Ham Iran - Russia Military Cooperation: Iranian Defense Minister”, *Turkish Weekly*, April 24, 2009.

“Iran Missile Experts in North Korea ‘to Help with Rocket Launch’”, *The Times*, March 29, 2009.

Roger Howard, *Iran Oil: The New Middle East Challenge to America*, I.B. Tauris, 2007, pp. 47 - 48, 113.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计划在伊朗投资30亿美元”,商务部网站, <http://www.china5e.com/oil/oilnews.aspx?newsid=8eb6e628-9b11-4717-8ff-f-a50df0883c1f&classid=%u77E3%u6cb9%u5929%u7136%u6c14>.

⑩ “中石化与伊朗合作开发伊朗 Yadavaran”, <http://oilgas.worldenergy.com.cn/show.php?itemid-30246/page-1.html>

奉行了“等距离外交”。

四、以伊对抗性关系的影响

以伊对抗关系对地区形势和大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以伊对抗关系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将是中东热点问题,中东出现突发事件乃至爆发危机的概率增大。2008年6月,一位名叫阿什塔里(Ali A shtari)的商人在伊朗以间谍罪被执行死刑。阿什塔里承认,他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5万美元,将伊朗敏感的军事、国防和研究中心的情报交给了以色列。2008年11月,伊斯兰革命卫队抓获3名以色列间谍,因为他们试图进入上层,借机暗杀军事科学家、炸毁战略军事与导弹设备。伊朗方面声称,还有3名间谍已经被监控。以伊情报战愈演愈烈,表明两国对抗关系正走向常态化。2009年2月,以色列总统宣布右翼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组阁。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讲话指出,新政府将致力于处理两个现实的棘手问题,一是应对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伊朗本身构成的挑战,二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2009年6月,伊朗将迎来大选,务实派哈塔米、前议长麦赫迪·卡鲁比均具有竞争力,但保守派领导人内贾德胜出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美国从伊拉克逐步撤军、影响力逐步下降,以伊很可能酝酿新一轮争夺,中东形势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以伊对抗关系改变了中东地区主要矛盾。过去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阿以矛盾,以伊爆发战略对抗后变成以色列同伊斯兰激进势力之间的矛盾。伊斯兰激进势力包括伊朗、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什叶派激进势力。以此为背景,中东初步形成以伊朗为首、以什叶派为先锋、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体的“反以联合阵线”,对以色列形成了战略反包围。中东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阿以冲突与伊核问题的相互交织,将引发中东政治力量的重组,增大了两大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

以色列向哈马斯发动的加沙战争是中东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两大热点问题盘根错节的新例证。近年来,以色列视哈马斯为伊朗在地中海沿岸的“棋子”,指责伊朗每年向哈马斯提供大约2500万美元的援助。以色列称,2001-2008年,哈马斯共向以

色列发射了8000枚火箭弹,造成24名以色列人死亡,1000人受伤,25万人被迫迁徙,这是以色列于2008年12月发动加沙战争的重要原因。以打击哈马斯的深意是遏制伊朗的扩张。加沙战争爆发后,伊朗外长穆塔基开展了一系列电话外交;内贾德总统则派出了22名特使奔赴邻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哈马斯,并宣布支持抵抗以色列侵略的力量,直到以色列崩溃。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指出:“为巴勒斯坦事业牺牲的人都是烈士。伊朗群众则上街游行,声援巴勒斯坦,还出现了上万人排队要求去前线抗以的场面。”2009年1月7日,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与哈马斯政治领袖哈立德·马沙尔在伊驻叙利亚大使馆举行会谈,哈马斯随后高度赞赏伊朗提供的道义和经济支持。此外,2009年3月有报道称,以色列曾多次袭击苏丹北部的运输队,此运输队据称走私的是伊朗经苏丹和埃及运往巴勒斯坦地区的武器。可见,巴以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不再是孤立事件,以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可能更趋尖锐。

最后,以伊对抗关系加剧了大国在中东的争夺。奥巴马政府多次提到美国准备对伊朗采取接触政策,特别强调美伊在保证格鲁吉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阿富汗稳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重申美国不会拿以色列的安全作交易,不会改变支持以色列的一贯政策,也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美国一直在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2008年9月,美国同意在以色列部署预警雷达系统,使以“箭式”(转第52页)

“Chronolog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4, 2008, p. 676

Nazila Fathi, “Iran Arrests 3 Militia Volunteers as Israeli Sp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6, 2008

“Netanyahu in Driver's Seat Despite Fewer Vote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February 12, 2009.

Yaakov Amidror, “The Hizballah - Syria - Iran Triangl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7.

“Gaza is the Smoke; Iran is the Fire”, *USA Today*, January 8, 2009.

“Mideast: Tehran Opts for Moral Support in Gaza War”,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January 12, 2009.

“As Hamas Continues to Fire Iranian-made Rockets, The Israel Project Begins TV Ad Campaign to Prevent War with Iran”, *Targeted News Service*, January 14, 2009.

往往强力扳回。里根对卡特、克林顿对老布什、小布什对克林顿都是如此。即使在同一届政府任内,如果遭遇强大反对声浪,中途改弦更张也不无可能。此外,历史上奉行对外强硬战略的美国总统,后世评价往往高于推行“缓和路线”的总统。例如,卡特因对苏过于软弱而被称为战后“最差总统”之一;里根的政策因大幅调整卡特路线、对苏强硬而被称为“里根革命”。奥巴马上台后修正布什外交的一系列举措已被某些人视为过于软弱,有可能成为“卡特第二”。还有评论说,奥巴马频频向“敌国”示好,很像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得太远”。年初奥巴马的救市政策已得罪一大批金融利益集团、汽车巨头,救市计划至今未见明显成效,如军事战略调整再得罪大批军工利益集团、保守势力,这番调整能走多远还难以断言。

此外,从奥巴马的经历看,他以参议员的身份平步青云,没有按部就班地通过逐级历练,对行政系统

的习惯、规则、运作方式显然缺乏足够了解,更谈不上对军事领域有多少了解,在军中还缺乏足够的威望。2009年1月份美国《军事时报》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有高达六成的现役美军官兵对奥巴马成为美军总司令感到怀疑和悲观。《陆军时报》评论说,奥巴马要想得到美军官兵的尊敬和认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奥巴马善走“大众路线”,他现在的调整是以背后的高民意支持率为后盾,与美国传统的上层精英路线还不是很契合。他的新背景、新面孔固然能带来一些新气象,但能走多远、美国上流精英阶层还能容忍多久殊难逆料。

(责任编辑:沈碧莲)

“Gorbachev: the Model for the Obama Doctrine”, 21 April 2009, <http://www.independent.co.uk>

Brendan McGarry, “2008 Military Times Poll: Wary about Obama”, Jan 7, 2009, http://www.amytimes.com/news/2008/12/military_poll_main_122908/

(接第31页)导弹防御系统更加完备,更好地应对伊朗的威胁。希拉里·克林顿也曾就以伊关系发表讲话指出:“以色列致力于和平交往、公开辩论、言论自由和法治,即便在面临严重威胁时也是如此。美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支持以色列,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将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同以色列站在一起,确保以色列人民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俄自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爆发军事冲突后,一直奉行强硬外交,在中东相继提升与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传统友好关系。俄必将乘以伊对抗之机,加大参与伊朗核项目建设的力度,加强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2009年3月16日,伊朗石油部长努扎里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签署了能源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表明两国已建立军事、政治、经济和能源等全方位合作关系。美俄是否会在中东培养代理人、恢复昔日的争夺关系甚至重蹈美苏冷战覆辙,有待进一步观察。法国同俄一样,一直谋求在中东建立军事基地,并希望同欧盟其他成员一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扮演“调解人”角色。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大国则从能源外交与维护地区稳定的双重角度审视以伊关系,有限介入中东事务。

面对以伊之间的战略性对抗,中国政府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与伊朗和以色列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为推动伊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及中东和平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强化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伊战略对抗既属于双边关系范畴,又折射出双方分歧的症结——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途径。中国今后在伊核问题解决机制中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争取让伊朗作为伊核问题六方机制中的谈判方而不是缺席的受审方,并鼓励伊朗作为未来巴以和谈的观察员。中国既应尊重以色列和伊朗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也应反对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既应考虑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应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分歧的做法。中国的和谐外交理念有助于推动以伊之间的战略对抗让位于战略对话,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责任编辑:黄昭宇)

Peter Crail, “Iran Space Launch Raises Missile Concerns”, *Ams Control Today*, Vol 38, No 7, 2008; Isabel Kershner, “U. S. Army Deploys a Radar System in Israel for Early Missile Detec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2008

“Sen. Clinton Reaffirms Commitment to Israel’s Security, Pledge to Deny Iran’s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US Fed News Service*, September 21, 2008